

# 二重证据与西藏古史重构

## ——论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西藏新史学的影响

霍 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关键词] 西藏古史;西藏考古;西藏史学

[摘 要] 文章认为,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将西藏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互结合起来重构西藏古史,从而开拓出西藏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这种“二重证据法”同时也体现出 20 世纪以来史学潮流的新变化,作为老一辈藏学家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从而对西藏新史学流派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D92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003(2008)04 - 008 - 07

所谓“二重证据法”,是由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创立的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其含义即借助于“地上之材料”(文献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材料)相互印证来研究和重建历史。这一学说及其实践对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与古史重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国家中具有史学传统的一个民族,从吐蕃时代创立藏文以来,便已有《吐蕃大事记年》等史学著作存在,其中一部分保存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写卷当中,早已被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sup>[1]</sup>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吐蕃藏文文献除手卷写本之外,还有简牍文字、金石铭刻等不同形式流传至今,<sup>[2]</sup>是研究西藏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藏族

史学的源头所在。吐蕃政权之后,随着后弘期藏传佛教派别的形成,藏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史学著作和藏族历史学家,形成具有自身民族、宗教、文化特点的史学风格与传统,对此前贤多有论述,兹不赘叙。

如果我们可以将上述藏族史家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史学著作的学术体裁、学术风格及学术流派称之为藏族“古史学派”的话,那么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不仅是这个学派优秀的继承者,更是新的藏族史学流派(本文暂且称之为“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西藏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恰白先生的学术成果极为丰硕,本文仅以先生在“二重证据法”上的若干研究例证,来论

[收稿日期] 2008 - 04 - 12

[基金资助]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四川大学“985二基工程”中国藏区与南亚创新基地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霍巍(1957—),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考古研究。

证其学术思想与实践上的创新及其对西藏史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 一

在西藏古史学派的历史著作中,十分注意对历史传说、历史记忆材料(其中包括今天历史学家们常常提到的神话传说、口述历史等)的利用,成为这一学派显著的特色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著作当中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几乎完全依靠古史传说,很难运用到地上或地下的实物材料。以成书于15世纪的著名藏族史学著作《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原名《贤者喜乐瞻部洲明卷》)为例,书中除涉及到藏族历史、宗教发展的线索之外,还有一定篇幅涉及到藏族社会的物质文化层面,如讨论吐蕃医学的产生、茶叶和碗在吐蕃的出现、刀剑在吐蕃的传布情况,等等,这些内容的设计在西藏古史学派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按理说,在物质生活这个层面是最能够将文献记载和实物材料相结合加以印证的,这在当代史学著作中已自不必言,但西藏古史学派的著作对此却尚无自觉。例如,由于刀剑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作者在书中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由于吐蕃历代国王的权势,以前没有的刀剑、茶叶、碗等珍奇物品都在吐蕃出现并发展”,并将刀剑的种类划分为五大类两小类,分类论述了它们的来源与特性,认为根据刀剑的出产地、用铁的种类、外形特征就可以作出大概的鉴别,如“尚玛类的刀剑刀背厚重,索波类的刀剑锋利,呼拍类的刀剑有刀鞘,古司类的刀剑有银色刀纹,甲热类的刀剑能够截铁。这些是实有的特征”。对于这些刀剑的来源和产地,作者写道:“尚玛是汉人的刀剑,是在(唐)太宗皇帝在位之时兴盛起来的,它是在皇帝的舅家

所在的地方,由一个叫尚萨错莫的人打造的,能砍断九层最坚硬的东西,因此产生了妇人最会打造兵器的说法。由于它是在尚城地方打造的、铁匠又是妇女,因此得名尚玛。”<sup>[3]</sup>很显然,尽管作者在著作的内容安排上体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但在史料运用、史实考证、叙事风格、描写手法等方面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模式,其研究结论也很难成为可靠的信史。类似这样的史论方法在西藏古史学派的著作当中屡见不鲜。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于旧的史学方法在吸收、继承其精华的同时,较之前辈藏族学者,其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在其研究当中采用了“二重证据法”,将古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与现代学术规范自觉衔接,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可从其代表性著作《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若干例证来加以说明,我们将在后文中论及。这里,首先应当注意到的是恰白先生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觉接受,这也是他能够将“二重证据法”自觉引入藏族古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该书第一章“西藏远古历史”第二节“关于西藏地域的形成”部分,利用传统的藏文文献对西藏地域划分为上、中、下三部的观点作了介绍,认为在“其它王统史书中也有个别不同的说法外,其余主要的内容提法与其它史书没有两样,如说海水干枯,长出茂密的森林,上、中、下三部一切地方布满了各类动物等的观点基本相同。”<sup>[4]</sup>与过去史书不同之处在于,恰白先生利用科学分析的方法从印度洋暖湿气流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入手,

本文采用的是陈庆英先生的汉文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所引该部著作均出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版,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出版,199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注出书名及页码,特此说明。

结合西藏的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等因素对西藏动植物种类的影响作出了说明,科学地指出:“从大自然的运动变化中,喜马拉雅山脉不断升高,使这一地区的天气、大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sup>[5]</sup>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对此,从藏族史书中出现的零散词句和到目前为止从地下发掘的石器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都相同。”<sup>[6]</sup>这是恰白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接受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与现代科学理论来研究西藏古史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在具体的研究结论上还有与学术界不同的看法与观点,但作为长期以来在西藏古史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藏族历史学家,能够在其晚年自觉接受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这种赞同将地下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认识论的产生,与恰白先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基本态度密不可分。在第三节“关于西藏人类的起源”中,恰白先生注意到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霍斯勒(汉译本常译为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等著作中对“进化论”思想的阐述,对从猿到人的类起源学说有充分的认识,对传统的“藏族人是猿猴与罗刹的后裔”这一说法作了评论,认为其“确实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进而指出:“但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不具备探索研究自然界事物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条件,无法作出符合科学的解释。现代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神话,这种说法是很不完善的。古代的思想意识和由此传出的各种说法怎么能够完全符合科学呢?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sup>[7]</sup>由此可见,较之西藏古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恰白先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自觉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并对“以前的历

史学家们在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有了正确的认识与评价,这一点也是恰白先生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又高于前人的根本原因和可贵之处。

### 二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地下考古材料的重视与运用,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多有体现,反映出他对“二重证据法”的具体实践。这里,我们仍以其代表性著作《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为例加以论述。

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一章“西藏远古历史”的第三节“关于西藏人类的起源”中,恰白先生专门列出“关于藏族人类起源的有关出土文物”,并对这些文物及其对于西藏人类起源问题的价值作了详细的论说,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仿佛大海,需要做符合科学的解释。尤其从最近一二十年在西藏发掘的大量古代实物可以找到藏区人类如何发展的一些科学证据。经过二十年的发掘,发现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的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谷物种子,甚至古人骨头等大量实物,从尼洋河岸发掘出古人骨头,有关专家详细研究后指出‘尼池(林芝)人’的骨头没有类人猿的原始特征,属于现代人。‘尼池人’的骨头是大约4,000多年前,即新石器时代或者铁器时代的(人骨)。”<sup>[8]</sup>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恰白先生在其论述中已经非常自如地采用了现代学术表述方法和规范的学术术语,例如,对西藏地下出土文物的年代划分用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考古学断代名称;对于各种出土文物的描述使用了石器、陶器、骨器等分类方法;同时还注意到诸如人骨和谷物种子这类遗物在西藏古史研究中的特殊价值。这是过去西藏历史著作中从未有过的进步。

恰白先生显然对西藏考古工作的进展有长期的关注,并且及时地将其成果加以吸收。如他在这部著作中还注意到:“从聂拉木、定日、申扎、墨脱、昌都等西藏上、中、下部地区发掘了许多石器、陶器、古人骨头等实物,特别是在昌都卡若发掘的古人房子、谷物种子、动物骨头、石器、陶器等文物,为研究西藏地区人类形成过程和西藏古代文化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sup>[9]</sup>从恰白先生反复强调以“科学依据”作出“科学解释”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地下出土的考古实物证据对于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是同等重要的,这与过去的古史学派只重文献传说的修史观念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恰白先生运用地下出土证据,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讨论西藏远古历史。如他在对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各类建筑遗址、骨器、陶器、装饰品等作过详细描述之后指出:“卡若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至今已有4500年至5000年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窥见,西南和西北的古人相互往来和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认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早就有形成并发展为人类的民族,藏族是由此形成的,绝非从其它地方迁移来的。坚持了与过去西藏古史学派主张的所谓西藏人种“南来说”、“北来说”、“印度迁来说”等传统学说完全不同的立场。但是,恰白先生同时也注意到:“卡若村落古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农业,附带进行狩猎活动。卡若文化是多种多样的……藏民族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如果从民族成分方面讲,不止是一种成分,而是一个拥有多种成分的民族。譬如在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混杂着毗邻地区的汉族、羌族、蒙古族等民族成分,不用说其它民族之中也含有藏族成分。”<sup>[10]</sup>这种认识

显然也是符合藏族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又如,他观察了卡若遗址中的建筑遗址之后,还特别指出:“(卡若)土石工程建筑和习惯三脚石锅灶的建造法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对加强研究藏族人的祖先出现在高原这一问题具有重要价值。”<sup>[11]</sup>这一细节或许连现代考古学者们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恰白先生除了在研究西藏远古历史时充分认识到地下考古发掘出土材料的重要性之外,在西藏其他历史阶段的古史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二重证据法”在恰白先生论著中运用实践的例证。

例如,在对吐蕃军队服饰进行研究时,恰白先生利用了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牍材料的记载:“《新疆木牍》说:魔鬼交给赛勒花色上装一件、白色黑皮装一件、羚羊皮上装两件、绫缎面皮袄一件、羚羊皮上装一件、下装一件、新旧丝巾各一条、丝带五条。恰白先生分析这些地下出土藏文木牍后作出推测:“由此可知,(吐蕃)赞普时期,藏族男子的服装是长袍之上套着氍毹、皮类、锦缎相饰的无袖上衣,也着皮类等制作的半月形布装以及下裙或短装,头缠丝巾。参加征战之时,身着甲冑,手执武器。”<sup>[12]</sup>此外,恰白先生还利用这些木牍考证了吐蕃时期的武器装备情况:“据《新疆木牍》记载,聂噶部中,拉杰承事,受王之记牌、盾牌、带剑套、平箭、弓弦、柄、石囊、石簧、箭袋。意思是:聂噶的军队中,拉杰为完成赞普的事业,接受武器记事牌、盾牌、剑和剑套、弓箭、石袋、石簧、箭袋等武器。从中基本上知道当时军人所使用的武器。”<sup>[13]</sup>这些例证都充分证明在研究方法上,恰白先生将地下出土材料证之以文献记载,利用“二重证据法”开展学术研究,较之西藏古史学派的历史著作,可以说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如果我们将前文所举《汉藏史集》对吐蕃

刀剑的研究与之作比较,可以看到恰白先生在理论方法和研究结论两个方面都是大大超越了前人。顺带可以指出的是,当恰白先生取得上述研究成果时,地下出土的资料还远远不够丰富,近年来,西藏、青海等地不断发现与吐蕃服饰与武器装备等有关的地下出土材料,其中从青海都兰吐蕃大墓中出土的丝织物,<sup>[14]</sup>以及青海廓里木等地发现的吐蕃木棺板画上所绘吐蕃人物形象的情况来看,与恰白先生的上述研究结论基本上是吻合的,说明其研究结论科学、可信。

恰白先生对考古实物材料的高度重视还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那就是他对西藏昌都吐蕃摩崖石刻文字的解读与研究。在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崖,曾发现大日如来及其八大弟子造像的摩崖石刻,在造像的下方还刻有古藏文题刻,恰白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其重要意义:“在过去的藏族史料及近期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吐蕃金石录》、《吐蕃文献选读》等书中没有记载或未曾正确记载。其原因是,西藏史料《王统世系明鉴》中载:‘此时公主与吐蕃使臣,已抵丹玛岩,即将七肘高的弥勒像一尊,及赞普行愿品经文刻于岩上,在那儿等候了一个月,但大臣(噶尔·东赞)未到’。看来似乎为文成公主入藏路过此地时所刻,但与所刻内容明显不符,书中是依据民间传说记载而已。有人可能认为在古代文献中未载之因是由于不值一记,但此文与古代文献中所载铜钟铭文的参考价值之高一比便知。”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恰白先生对传统藏文文献采取了科学的态度,而不一味盲从;第二,对于考古实物材料与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认识,认为前者的重要性应当高于传世文献记载。这些思想都是超越前人的。

在对这通摩崖文字进行考释的具体过程中,更是充分体现出恰白先生将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材料紧密结合来研究历史问题的现代学术意识。文中他不仅通过石刻文字考订了此处摩崖石刻的所建年代,对于其特点及意义也作出5个方面的深入分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所刻《普贤菩萨入行赞》这一段是由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未改动过。因此对研究译经的次序和特点、发展及藏文语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他还指出:“最为重要的是刻文的下部分……赞普赤松德赞时,佛教僧侣不仅是宗教的主持,而且还封授有政事大伦(宰相)即掌有政治大权者,封‘金符之下官衔’,说明赞普对佛陀信奉者的敬仰和赏赐远远超过了其父、兄时期,其表现在赐给僧侣官位和大权。”这些通过对考古实物碑刻材料进行研究得出的意见,对于我们认识吐蕃政权时期佛教与社会关系、藏文刻经与藏语文字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恰白先生对这通石刻文字中的一些细节观察得十分认真细致。他发现:“此摩崖石刻还有一个特点是详载了创建该

有关这批青海吐蕃墓葬出土大棺板画的情况,可参见下列论著: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也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即:程起骏著《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著《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著《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参见该刊第84~98页;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载亚洲人文联网“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 论文提要集,香港,2006年6月;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载《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恰白·次旦平措撰、郑堆等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以下凡引自此论文者不再另行注出。

文物的总仆役者即主管工程所需和人员生活者为俄欧寺乃旦郎曲热和司桑布二人担任,主领头即技术总指挥是由比丘西晒和比丘松巴新、安当埃等担任。正式在摩崖上刻者为乌给年赤夏、学勒工、懂马岗及汉人黄鹏增父子、华豪景等,另外还附刻有汉人的姓名及似为表达愿望的几十个汉字,因此作为千年前的西藏历史文物能够记载工程管理和指挥、技术人员的姓名,实为罕见。当时的目的大概是对佛法的祈祷和渴望分到善果,但现在对研究历史者来说这些可以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资料。如从当时这样一个石刻工程有经营收支、技术指挥、具体工作人员等这些结构,对调查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管理制度等获得了极好的资料。六位刻字者中有三位汉族,这也说明了在众多西藏建筑中汉藏民族携手并肩、紧密合作的传统”。这样的观察与分析完全建筑在对考古材料本身的析读基础上,从中“透物见人”,结合文献和历史资料对考古材料背后的历史背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论证,最后上升到吐蕃社会结构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层面提出问题,无论从方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视为现代学术规范下的研究典范。

综上所述,在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研究论著中,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史学观,也充分体现他对“二重证据法”的高度重视与理论实践,这是他最终能够超越前人、在西藏史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

回顾 20 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史上的发展变化,曾经有学者指出:“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 20 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

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sup>[15]</sup>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藏史学领域也同样发生着这种变化,而在历史潮流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面,引领时代风尚的转化,对于今天西藏新史学的产生与形成无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经历了西藏社会历史变革的风风雨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从“西藏古史学派”向“西藏新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在他的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西藏传统史学影响的痕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老一辈西藏史学家们顺应历史潮流、变革思想观念、学习科学理论、改进研究方法的不懈努力和不倦追求的可贵精神。

恰白先生学术成就巨大,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的这篇小文当中难以一一叙及,但仅就他在“二重证据法”的理论实践方面,我们或许也可窥见在他学术生涯后期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对于西藏史学传统的转换具有的重要影响,它一方面吸收、继承了西藏传统史学(即本文所称的“西藏古史学派”)注重文献与传说的合理成份;而更为重要的是引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叙述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对旧有传统都有所扬弃,推陈出新。今天西藏新史学的形成和一代现代学人的成长,可以说正是踏着前人的足迹不断创新、不断前行的结果。

众所周知,除吐蕃时期的敦煌写卷、简牍文字、金石铭刻之外,西藏过去的历史著作成书年代普遍偏晚,对西藏远古社会历史的情况(尤其是吐蕃政权以前)记载甚略,语焉不

详之处甚多,所以要重构西藏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前文所举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推进了人们对于西藏史前社会的认识便是一个例子。即便是进入到西藏有语言文字记载的吐蕃政权之后,文献资料仍然严重不足,也需要地下发掘考古材料来加以补充和完善,吐蕃政权社会生活的许多具体方面,如前文谈及的藏族服饰、武器装备、居住与交通、墓葬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考古材料来进行复原。所以西藏古史的重构离不开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近年来,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不仅是二重证据,还可以是三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的综合利用,才有可能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一面。<sup>[16]</sup>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史学实践对于重构西藏古史的学术路径的抉择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应当说,像恰白先生这样自觉转变思想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学者,在西藏老一辈史学家当中并不多见,所以更显难能可贵。

### [参考文献]

- [1] 王尧、陈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2
- [2] 王尧. 吐蕃金石录 [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
- [3]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 [M]. 陈庆英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136~142
-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恰白·次旦平措等.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M]. 陈庆英等译. 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6: 5~6, 6, 6, 8~9, 14, 14, 14, 15, 56, 56~57.
- [14] 许新国. 都兰出土大批唐代丝绸见证丝绸之路“青海路”[J]. 文物天地, 2004, (10); 许新国. 中国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葬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A].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C].
- [15] 徐太山. 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1.
- [16] 沈颂金. 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 73~79.

## Dual Evid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Ancient History: Discussions on Professor Chaphel Tseten Phuntsog's Influence on Tibetan New History

HUO Wei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Keywords:** Tibetan ancient history; Tibetan archaeology; Tibetan historical study

**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professor *Chaphel Tseten Phuntsog*, as the founder and inaugurator of Tibetan new history, reconstructed Tibetan ancient history by integrating Tibeta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unearthed from underground and the texts, accordingly he exploited a new theoretical path of Tibetan histor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hod of dual evidence reveals the new change of the trend of history from the 20th century. As an elder generation and a famous Tibetologist, professor *Chaphel Tseten Phuntsog* conformed this historical trend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Tibetan new history.

[责任编辑:仓决卓玛]